上　　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资料选辑

五四运动后各个时期形成的史料，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超过了古代和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时期，围绕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两大事件，留下了大量珍贵史料。

首先是档案文献史料。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档案文献史料重要者及综合性的有：《六大以前》（中共中央书记处 1941 年 12 月至 1942 年 10 月编辑出版，1951 年再版）、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陆续出版）、《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起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刊印）、彭明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1989 年出版）等。专题类重要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 1959年版）、天津历史博物馆编《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编《五四时期妇女运动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北京出版社 1979～1981 年版）、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

《五四运动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胡汶本等编《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中国共产党第二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及《中国现代史革命史料丛刊》中的《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新民学会资料》、《一大前后》等。旧政权档案文献史料综合类的有：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9～1981 年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华书局 1977～1984 年版），吴祖湘、刘绍唐主编《民国史料丛书》（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1 年开始影印出版），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等。专题类有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年版）、孙彩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简介》（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等。

报刊是一个时期的眼睛及喉舌，对历史史实反映及时、记录详备，是史料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五四”时期中国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革命的、较进步的、中间地带的、包括反革命的报纸杂志，都对同期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了记录。由于立场的不同，角度的差异，在评价上对同一事件也许会千差万别，出入很多，但这正可使我们以多维立体的镜头把握当时的历史。从中可窥及五四运动及党的创立历程的报刊有下列几种：《新青年》1915 年 9 月创刊于上海，陈独秀主编。最初名为《青年杂志》，自第二卷起更名为《新青年》。1920 年 5 月上海党的发起组成立，成为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新青

年》经历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它的内容充分反映了“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文化思想运动进而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重要过程。《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改刊于北京，主要编辑为李大钊、胡适等人。尽管该刊在胡适主编期间登载了一些大肆宣扬实验主义激烈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仍不失为研究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考报刊。《共产党》，1920年11月创刊于上海，李达任主编，共出版七期，是我们研究建党史的重要材料之一。此外，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周恩来主编的《觉悟》、《天津学生联合会公报》、恽代英主编的《互助》等都是这一时期颇有影响的领风气之先的革命报刊。1920年8月15日创刊于上海的《劳动界》及1921年8月创刊于北京的《劳动音》，则是这一时期反映工运历史的重要材料。1916年8月15日创刊于北京的《晨报》、1872年创刊于上海的《申报》、1902年6月于创刊天津的《大公报》、1910年创刊于《东方杂志》、1922年在北京创办的《努力周报》等，作为中间势力主办的报刊，也对该段历史有过基本的记录。

这一时期的回忆录史料有：何长工著《勤工俭学生活回忆》(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胡适自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北京学生界宣言（两件）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

（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原载《每周评论》第 21 期，1919年 5月 11 日）

（二）北京学生界宣言

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险，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已有由五国公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黯天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望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上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公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条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

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拱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撒、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独立，毋宁死。"失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讲，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选自《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81 页）

中国留法工人和学生迫使中国代表拒签和约

吾国在巴黎的专使居然将对德和约拒绝签字了。……除了官电的报告以外，关于当时拒绝签字的情形，记者还略略听得一些。第一说是官场方面传出的，据说二十八日那一天，各专使的寓所满被侨法的中国工人① 和学生围住了，不准专使出门，扬言如果出门，当扑杀之。吾们已预备了：每一个专使的命用三个人的命去偿他。这预备偿命的人已开了名单，不管要出门的专使是被谁打死的，这预备偿命的人总去偿命。因此专使不敢出门，二十八日未曾列席，这与官电的报告都说二十八日专使没有出席，是很

①据《民国日报》七月七日报道说："至德代表莅法之日，我国旅法华工万余人纷纷集议，向各专使请求拒绝签字。翌日（即全约签字之日），旅法华工集合至三万余人，奔走呼吁，其结果则我国专使声明山东不保留，和约不签字云。又据某使馆之消息，尚谓华工曾经将专使寓所包围，以致专使等不能赴会签字云云。"

近似的。第二说是东交民巷方面传出，说陆征祥先期因被侨居巴黎的中国学生和工人逼得无法，躲往一乡村医院，托言养病去了。二十八日，王正廷出席拒绝的。这两说的确否，记者远在北京，无法断定。

（原载 1919 年 7 月 6 日《时事新报》，选自《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 476 页）

陆征祥等被迫放弃签字的电文（二则）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1）大总统钧鉴：和约签字，我国对于山东问题，自五月二十六日正式通知大会依据五月六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去后，迭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另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直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留一线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断至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内省既觉不安，即征诸外人论调，亦群谓中国决无可以轻于签字之理，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当即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等语，姑留余地。窃惟祥等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自此以往，利害得失，尚难逆睹，要皆由祥等之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主座及全国之忧。乞即明令开去祥外交总长委员长及廷、钧、组等差缺，一并交付惩戒；并

一面迅即另简大员，筹办对于德、奥和约补救事宜，不胜待罪之至。祥、廷、钧、组。二十八日。

（2）分送唐少川、朱桂莘两议和代表鉴，并请转全国各团体、各报馆鉴：吾国对于德约仅争保留山东三条，乃直至今日，穷尽方法，卒归无效。祥等因此次和会当谋世界永久和平，论是非不论强弱，故不畏强御，提此主张。不幸事势中变，难遂所期；然吾国仍不能迁就，致成自杀。祥等已拒绝签字。惟外势迫切如此，吾国若再长此鹬蚌相持，则亡将无日，此不绝如缕之国命，今即悬诸上海会议。当此创巨痛深之下，谨痛哭陈词，一致呼吁，务求双方牺牲，从速解决一切纠纷，而一以维持国本为前提，庶几种种问题无难立决。全国一致对外，卧薪尝胆以救危亡，否则国将不存，争于何有？临电怆痛，诸希明察。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胡维德、孔祥柯、许宗汉、郭秉文、徐谦、汪兆铭等。俭（二十八日）。印。

（原载 1919 年 7 月 5 日《时事新报》）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　适

本报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

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是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

派的具作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达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甚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钞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

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原载《每周评论》第 31 号，1919 年 7 月 20 日）

再论问题与主义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七日）

李大钊

适之先生：

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 31 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一、“主义”与“问题”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什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

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灭。从前信奉英国的 Owen 的主义的人，和信奉法国 Fourier 的主义的人，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新村”。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味的事实，都是他们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继承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Owen 派与 Fourier 派在美洲的运动，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像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而 Noeyes 作“美国社会主义史”，却批评他们说 Owen 主义的新村落，Fourier 主义的新团体，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又不是 Owen 主义者，又不是 Fourier 主义者，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犹尚俨存。这日向的“新村”，有许多点像那在美洲新大陆上已成旧梦的新村。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说，他们的企划中，所含的社会的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此次东行，在日向颇觉愉快”。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

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做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新觉罗家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般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全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代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二、假冒牌号的危险　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亚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书，人人都称赞他，却没有人读他。马查士留下了一部书，没有一个人读他,大家却都来滥用他。英人邦纳 Bonar 氏早已发过这种感慨，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招假冒招牌的危险。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有汪正大等来混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

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假冒牌号的人，我们越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三、所谓过激主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什维克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游欧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真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什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以后展转传讹，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最

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后来又听人说，他们把克鲁泡脱金氏枪毙了，又疑这话也是谣言。据近来欧美各报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他们那里知道 Bolshevism 是什么东西，这个名辞怎么解释？不过因为迷信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他译作“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看见先生们的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看见章太炎、孙伯兰的政治论激烈一点，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这个口吻，是根据我们四千年先圣先贤道统的薪传。那“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逻辑，就是他们的唯一的经典，现在就没有“过激党”这个新名辞，他们也不难把那旧武器拿出来攻击我们。什么“邪说异端”哪，“洪水猛兽”哪，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若说这是谈主义的不是，我们就谈贞操问题，他们又说我们主张处女应该与人私通。我们译了一篇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又来说我们提倡私生子可以杀他父母。在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发言论事，简直的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

四、根本解决　“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